

# 歷史語言學研究



歷史語言學研究

#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四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編



2011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歷史語言學研究,第4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ISBN 978-7-100-08466-6

I. ①歷… II. ①中… III. ①語言學史—文集 IV. ①H0-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38238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ÌSHÌ YŪYÁN XUÉ YÁNJIŪ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四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編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印刷廠印刷

ISBN 978-7-100-08466-6

---

2011年12月第1版 開本 787×1092 1/16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定價: 元

顧問（以漢語拼音為序）：

貝羅貝 丁邦新 江藍生 蔣紹愚 柯蔚南 馬提索夫 梅祖麟

編輯部（以漢語拼音為序）：

曹廣順 馮勝利（特邀） 李明 羅端（特邀） 孫朝奮（特邀）  
吳福祥 楊永龍 張敏（特邀） 趙長才 祖生利

本輯責任編輯：

曹廣順 楊永龍

封面題字：

丁邦新

# 目 錄

試用對比分析看《老乞大》中的特殊語言現象·····	遇笑容(1)	
古本《老乞大》的語言性質·····	祖生利(17)	
古本《老乞大》中的“兀的”“兀那”“阿的” ——兼談古本《老乞大》與蒙文直譯體之語言特徵及其地位·····	船田善之(54)	
古本《老乞大》的特指疑問句和是非疑問句·····	趙長才(71)	
元代語言接觸背景下處置式的演變·····	張 頴(91)	
試論新近發現的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象院題語》的語言性質·····	竹越孝(102)	
從“領有”到“空間存在”		
——上古漢語“有”字句的發展過程·····	大西克也(112)	
從語義地圖看上古漢語的雙及物結構·····	潘秋平(129)	
上古漢語的“也”和句子分析·····	李佐豐(160)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介詞“於”“于”“乎”·····	張玉金(174)	
近代漢語時期有定性表達手段考察·····	張 文(202)	
疑問標記疑問用法與非疑問用法之關係探討·····	傅惠鈞(218)	
“X 不得”的詞彙化·····	李小軍(230)	
否定構式“X+個+詈語名詞”探析·····	雷冬平 胡麗珍(239)	
敦煌《藏漢對照詞語》解讀及所記的唐五代虛詞語音變化·····		鄭張尚芳(250)
《蒙古字韻》在古官話研究中的價值·····	沈鍾偉(264)	
“懶”“賴”和“無賴”的詞義關聯演變考·····	徐時儀(276)	
奈良時代日僧所撰《華嚴音義》與則天文字研究·····	梁曉虹(286)	
近年來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綜述(2005—2010)·····	楊永龍(302)	
編後記·····	(310)	
《歷史語言學研究》稿約·····	(311)	

# 試用對比分析看《老乞大》中的特殊語言現象

遇笑容

**提 要** 對比分析透過不同語言的對比,確定語法點習得的難易度,以及它們在語言習得中造成干擾的可能性。運用對比分析考察不同版本《老乞大》的語言變化可以看到,干擾的出現與習得的難易度有關,干擾的消失與習得的難易度和規律的認知度難易度有關。

**關鍵詞** 《老乞大》 特殊語言現象 對比分析 語言接觸



對比分析主要是對比兩個或兩個以上語言間的相異性。歷史語言學、比較語言學以及翻譯理論都曾用對比分析來探究語言的宗譜、分類、差異等等。在應用語言學中,對比分析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它最大的貢獻是透過目標語和母語的對比,根據兩個語言間的差異排出語法點的難易度,以便在教學中參考,同時也可以觀察母語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可能造成的干擾。

《老乞大》為元、明之際朝鮮半島高麗、朝鮮兩朝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目前學界已有不少關於《老乞大》四個版本語言研究的專著。從舊本《老乞大》《老乞大諺解》《老乞大新釋》到《重刊老乞大》<sup>①</sup>(以下分別稱為 A、B、C、D 本),我們可以看到從似漢非漢、似蒙非蒙的元白話轉變為純粹漢語的過程。漢語、蒙語分屬漢藏、阿爾泰兩個不同的語系,為何非漢語成分會在早期《老乞大》版本中出現,而在後來的版本中又相繼消失,目前的研究中似乎還沒有系統的說法。本文嘗試用對比分析中語法點難易度的評定框架,來看《老乞大》四個不同版本中某些特殊語言成分的出現與消亡的過程和原因。

## 一 對比分析

對比分析學界或名為對比語言學。對比語言學與比較語言學都是把不同語言作為研究的對象,也都研究語言與語言間的相似與相異點。兩者間最大的不同,是對比語言學基本通

過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言作詳盡的比較,看其間的不同;而比較語言學或語言類型學則是以大量不同語言的語料為基礎,探討其間總體的概括性。換言之,對比語言學是以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為對比對象,研究語言間的差異性;比較語言學則是以收集多種世界不同語言為其研究基礎,考察不同語言特點的相關、相似性,找出語言間或語系間的關係。(Greenberg 1966; Comrie 1986)因此比較語言學為異中取同,而對比語言學(對比分析)是同中取異。(陳俊光 2007:110) (Von Humboldt 1920's; Whorf 1940's)兩個自不同角度觀察語言的學派看似相反,然而也有相輔相成之處。研究語言類型學的學者孔博納(Bernard Comrie 1986)就曾結合兩種不同研究角度的長處,作過英語和俄語的對比類型研究。

最早提出對比分析概念的是美國結構語言學家 Fries (1945),對比分析的理論在應用語言學家 Lado (1957)提出的對比分析假設後受到重視。幾十年來,對比分析理論有不同的演變階段,主要功能基本上是用來分析中介語(James 1980),考察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以及語言正、負遷移(Gass, Selinker 1983; Odlin 1989)或跨語言影響(Odlin 2003)的研究。在應用語言學,特別是第二語言習得或編寫教科書方面,對比分析中難易度的評定是一個可以提供比較客觀考察和評估的工具。基本概念是以為 X 與 Y 語言中差距越大之處,越難習得。當 X 語的人學習 Y 語言時,會把 X 母語的東西帶入 Y 語中。帶入的東西多少與習得困難度有關,困難度愈高愈容易帶入,因為困難度愈高的愈易受母語干擾。(Odlin 1989; 鄧 2003)

## 二 用對比分析看《老乞大》四個版本

《老乞大》是教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作為語言教科書,它的性質應該是反映當時的口語。然而《老乞大》最早的兩個版本(A本、B本)中有相當多與當時漢語語法不一致的地方,也就是所謂元白話中的特殊語言現象。元白話是元代使用的受蒙古語影響的漢語,是一種夾雜蒙語詞匯和句式的漢語。漢語是一種孤立語,缺少形態變化,語法手段主要靠語序和虛詞。而蒙語是黏著語,主要依靠詞尾的變化來表現其語法關係,格系統豐富。在語序上,漢語與蒙語也有很大的分歧,漢語語序是主謂賓(SVO);蒙語是主賓謂(SOV)結構。對於元白話中哪些成分受到了蒙語的影響,李泰洙、祖生利以及曹廣順、陳丹丹都有專著、專文討論。

李泰洙(2003:98—101)根據四個不同版本《老乞大》的語言,提出 14 世紀中葉到 18 世紀中葉的漢語中出現了一些新成分、新功能和新格式。新成分如句末語助詞“有”;新功能如動物名詞等後加複數詞尾“每”或“們”、方位詞格助詞用法;新格式如 SOV、OV 句的大量出現等。曹廣順、陳丹丹(2009:108—123)對古本《老乞大》的特殊語言現象做了統計、分析與論證,以為“元白話確實受蒙古語影響,產生了一些異於漢語標準語法的特殊語言現象”。對

於某些特殊語言成分的分析各家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句末“有”的功能判定,李泰洙(2003)認為是句末語助詞,祖生利(2007)認為是動詞的時體標記,但他們對這些特殊語言成分的來源,一致認為是來自蒙古語句末的助動詞。這些在元白話中受蒙古語影響的特殊現象是漢語和蒙語、也是孤立語和黏著語之間差異最大的地方。有趣的是,在《老乞大》四個版本中,這些差異基本上僅出現在 A、B 兩個版本中,而少見或不見於 C、D 本中。由於對比分析是用來比較兩個語言差異之處,並用母語和目標語之間的差距來測度、評估母語干擾、正負遷移、習得難易等問題,本文擬嘗試使用對比分析的方法來探討《老乞大》四個版本中某些特殊語言現象的出現與消亡問題。

### 三 對比分析語法點難易度評定原則

#### (一) 難易度假設

在 Lado 等學者提出對比分析的理論,特別是對比分析假設(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之後,雖有不少學者從第二語言習得等的研究角度,提出母語與目標語之間形式的差距並不能作為預測語言習得難易的絕對標準(Danesi and Pietro 1991: 26-28; Ellis 1985:29),但應用語言學家基本公認母語和目的語的形式差距,是制約難度的一個重要因素。鄧守信(2003)根據這種語言間的差距提出的兩個語法難易度的假設:Ⅰ.語言間的句法結構差距越大,對學習者而言其結構的困難度就越高;Ⅱ.語言間的語義結構差距越大,對學習者而言其結構的困難度也越高。(陳俊光 2007:78)

#### (二) 難易度評定原則

鄧守信(2003)用 Westney (1995) 及鄧在 1997 至 2001 年間提出的論點為基礎,提出五個難易度評定原則。

原則一:結構越複雜,困難度越高。(Westney 1995)

根據這個原則,鄧守信進一步細分困難度高的結構包括下列幾種:Ⅰ.母語與目標語沒有相對應的結構時,困難度高;Ⅱ.層次結構複雜,困難度高;Ⅲ.非典型結構困難度高;Ⅳ.搭配限制越嚴格,困難度越高。

原則二:語義越複雜,語法點的困難度越高(Westney 1995)

Ⅰ.語法點的語義具有多重詮釋,則困難度增高;Ⅱ.語法點的語義具有引申義時,則困難度增高。

原則三: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結構差距,語義差距)(鄧 2003)

鄧指出此一原則與母語與目標語之間的遷移有關。如果目標語的語法點與母語系統完全相對應時,便可產生最大正遷移;反之,如果兩個語言的語法結構或語義之間有極大差異時,則負遷移最大。

原則四:越不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鄧 2003)

原則五:語用功能越強,困難度越高(鄧 2003)

### (三) 在對比分析基礎上的困難度等級模式

Practor (1967)根據零遷移、正遷移、負遷移制定了一套困難度等級模式。

零級:母語與目標語對應,兩個語言無差異,正遷移。

一級:母語裏是分開的,但在目標語裏是合併的。如英語人稱代詞有陰陽性、主格受格之別,但漢語裏不分。

二級:母語裏有的規則,但目標語裏沒有。如英語疑問句語序改變的規則,漢語沒有。

三級:母語裏的某個規則/結構在目標語中有所對應,可是使用規則有差異,或語序不同。如英語、漢語都有關係子句,但是位置不同。

四級:目標語中某個規則/結構,在母語中沒有可以對應的。如漢語中的處置式。

五級:母語中某個規則/結構,在目標語中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規則/結構。如英語動詞加“-ing”可以對應漢語的“在+V”和“V+著”。

Practor 認為由零到五的六個等級可以劃分出第二語言習得的難易度。他以為這樣的劃分可以幫助教學方案和策略的制定,比較能客觀地判斷學習的難度。

以上所引述難易度假設和難易度判定標準可以作為中介語或第二語言習得中語言錯誤出現與消失的研究基礎。下面我們擬用對比分析理論中有關難易度的研究成果,探討《老乞大》不同版本中特殊語言成分使用情況的變化及其原因。

## 四 用對比分析看《老乞大》四種版本特殊語言成分

### (一) 句末“有”

句末“有”的大量使用是元白話最明顯的特殊語法特點之一。這些出現於句末的“有”字實際上並不是一個詞,其中包含動詞、句末助詞等不同的類別。謂語動詞(包括用於判斷句的)“有”放在句末,賓語前置,這類“有”字句是元白話的典型特殊句型之一。元白話是蒙古人沒有掌握好漢語語法的一種變形漢語,其母語是蒙語,目標語是漢語。蒙語語序為 SOV,漢語是 SVO,兩個語言語序正好相反。當蒙古人沒有學好漢語的時候,母語語序造成了這些動詞“有”處於句末的句子的出現。句末助詞“有”比較寬泛地說是表達一種語氣,在漢語中語氣詞出現的位置和表語氣的“有”相同,只是表達方式有別,漢語使用專門的語氣詞,元白話選擇了與動詞同形的句末助詞“有”。這兩種情況在第二語言習得中的困難程度可以視為三級。以下為它們在四個《老乞大》不同版本中的用例情形:

句末“有”:53 例

動詞“有”7 例(如例 1、2、3),例 1 用於 A、B,其他的只用於 A。

用於判斷句的 3 例(如例 4、5、6),例 4 用於 A、B,其他的僅用於 A。

兩類“有”處於句末的用法加起來一共 10 例,B 中出現 2 例,B 以後就不再使用了,保存到 B 的比例是 20%。

(1)

舊 A:拜揖哥哥,這店裏賣毛施布的高麗客人李舍有麼?

翻 B:拜揖大哥,這店裏賣毛施布的高麗客人李舍有麼?

新 C:大哥作揖了,這店裏卻有賣毛藍布的,朝鮮客人李舍麼?

重 D:大哥作揖了,這店裏賣毛藍布的朝鮮客人李舍有麼?

(2)

舊 A:爲甚麼這般的歹人有?

翻 B:爲甚麼有這般的歹人?

新 C:爲甚麼有歹人呢?

重 D:爲甚麼有歹人?

(3)

舊 A:書信有。

翻 B:有書信。

新 C:有書信帶來了。

重 D:有書信帶來了。

(4)

舊 A:是漢兒人有。

翻 B:是漢兒人有。

新 C:是漢人啊。

重 D:是漢人。

(5)

舊 A:若是掩人德,揚人非,最是歹句當有。

翻 B:若是隱人的德,揚人的非,最是歹句當。

新 C:若是隱人的德,揚人的惡,最是不好的事情。

重 D:若是隱人的德,揚人的惡,最是不好的事情。

(6)

舊 A:這參是新羅參有。

翻 B:這參是新羅參也。

新 C:這參是新羅參。

重 D:這參是新羅參。

語氣 43 例,只用於 A 的有 39 例(如例 1、2、3),例 3 在 B 中變成了“有餘”,這顯示,B 的時候人們可能已經不太知道元白話中“有”的準確意義了。另外 1 例用於 A、B,1 例用於 A、B、C(例 4)。

(1)

舊 A:你底似的休早行,俺聽得,前頭路澁有。

翻 B:你十分休要早行,我聽得,前頭路澁。

新 C:你們不要十分早行,我聽得,前頭路上甚惹有歹人。

重 D:你們不要十分早行,我聽得,前頭路澁有歹人。

(2)

舊 A:我則道是和俺這裏一般打水有。

翻 B:我只道是和我這裏一般打水。

新 C:我們心裏只說,是與我這裏一般打水。

重 D:我們只道,與我這裏一般打水。

(3)

舊 A:滿七托有,官尺裏二丈八,裁衣尺裏二丈五。

翻 B:滿七托有餘,官尺裏二丈八,裁衣尺裏二丈五。

新 C:滿七托有餘,官尺足有二丈八,裁衣尺足有二丈五。

重 D:滿七托有餘,官尺足有二丈八,裁衣尺足有二丈五。

(4)

舊 A:兀那西頭有。

翻 B:那西頭有。

新 C:在那西頭有。

重 D:在那西頭。

語氣詞“有”在《老乞大》中使用數量大,但在 A 之後向漢語“回歸”的速度較快,這應該與其難度低,只要一個簡單的詞彙替換就可以解決問題有關。

## (二) 語序:母語 OV $\rightleftharpoons$ 目標語 VO

漢語是 VO 型語言,蒙古語則是 OV 型。蒙古人學習漢語,有一個從母語 OV 語序向目標語 VO 語序轉變的過程。同時,漢語自身也使用受事主語句,句型的表層結構和 OV 語序相似,這使得在“母語 OV  $\rightleftharpoons$  目標語 VO”習得過程裏,既有語序差異,又有不同結構的混淆。按照困難度的判定原則:

目標語習得困難度:三級(母語裏的某個規則/結構在目標語中有所對應,可是使用規則有差異,或語序不同)。

五級(母語中某個規則/結構,在目標語中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規則/結構)。

同樣是由於上述原因,《老乞大》中 OV 語序句子使用的具體數字不是很好統計,就目前看到的有 13 例,其中在 A 中使用 OV 語序,B 以後換成 VO 語序的有 5 例(例 1、2、3);在 A、B 兩種本子中使用的有 6 例(例 4、5);在 A、B 本中使用,C 中換成“把”字句的 2 例(例 6、7)。

(1)

舊 A:但滾的一霎兒,將這切了的草,豆子上蓋覆了,休燒火,氣休教走了,自然熟也。

翻 B:但滾的一霎兒,將這切了的草,豆子上蓋覆了,休燒火,休教走了氣,自然熟了。

新 C:但看水開了一會兒,把那 的草,放在豆子上,蓋好了鍋,也不用燒火,只教不要走了氣,自然熟了。

重 D:但看水開了一會兒,把那 的草,放在豆子上,蓋了鍋子,不用再燒火,別教走了氣,自然熟了。

(2)

舊 A:俺老實對你說,俺自穿的不是,要將投鄉外轉賣,覓些利錢去,你老實索價錢。

翻 B:我老實對你說,不是我自穿的,要拿去別處轉賣,尋些利錢的,你老實討價錢。

新 C:我老實對你說,不是我自己穿的,要拿去別處轉賣,尋些利錢的,你老實討價錢。

重 D:我老實對你說,不是我自己穿的,要拿去別處轉賣,尋些利錢的,你老實討價錢。

(3)

舊 A:這段子外路的不是,服地段子有。

翻 B:這段是南京的,不是外路的。

新 C:這紬子是南京的,不是別處來的。

重 D:這紬子是南京的,不是別處來的。

在 A、B 兩種本子中使用的有 6 例(例 4、5)

(4)

舊 A:主人家,別處快鐮刀借一箇去。

翻 B:主人家,別處快 刀借一箇來。

新 C:主人家,你可往別處,借一把快 刀來。

重 D:主人家,你可往別處,借一把快 刀來。

(5)

舊 A:你稅了契時,到明日,俺下處送來。

翻 B: 你稅了契時, 到明日, 我下處送來。

新 C: 你稅了契, 明日送到我下處來罷。

重 D: 你稅了契, 明日送到我下處來。

在 A、B 本中使用, C 中換成“把”字句的 2 例(例 6、7)。

(6)

舊 A: 你燒的鍋滾時, 下上豆子。

翻 B: 你燒的鍋滾時, 下上豆子。

新 C: 你把鍋燒滾了, 下上豆子。

重 D: 你把鍋燒滾了, 下上豆子。

(7)

舊 A: 布帳子疾忙打起者, 鋪陳整頓者, 房子裏搬入去者。

翻 B: 布帳子疾忙打起著, 鋪陳整頓著, 房子裏搬入去著。

新 C: 把帳房忙打起來, 鋪陳整頓了。

重 D: 把帳房忙打起來, 鋪陳整頓了。

依照以上的分析, B 中有約 62% 的 A 本中 OV 語序的句子保留了下來, 到 C 本中雖然 OV 語序的句子不見了, 但其中的 2 例被改成了“把”字句, 仍然留有 OV 語序賓語前置的痕跡。

### (三) 格標記

漢語和蒙古語在語法手段上一個明顯的不同, 是漢語使用介詞, 不使用格標記; 蒙古語反之, 大量使用格標記來表達語法關係, 不使用介詞。在元白話中使用不同於漢語表達手段的格標記, 也就成了元白話與當時漢語的一個主要區別。這些格標記一般都被認為是來自於蒙古語的影響, 是蒙古人學習漢語的過程中, 受到母語的干擾, 把蒙古語的語法成分帶進了他們習得的漢語。在《老乞大》中常見的格標記如: 根底/行。

目標語習得困難度: 四級(母語干擾; 母語中無對應規則)

格標記“根底”出現 5 次, A 本之後有 1 例仍保留於 B(例 1), 2 例在 B 本“根底”的位置上換用了“上/跟前”(例 3)。B 本之後就不見使用了。

(1)

舊 A: 你誰根底□文書來?

翻 B: 你誰根底學文書來?

新 C: 你你跟著誰學書來著?

重 D: 你跟著誰學書來?

(2)

舊 A: 你則拿著覷牙根底。

翻 B: 你只拿著牙齒看。

新 C: 你只看牙, 便知歲數。

重 D: 你只看牙, 便知歲數。

(3)

舊 A: 明日病疴了時, 大醫根底重重的酬謝也。

翻 B: 明日病痊疴了時, 太醫上重重的酬謝。

新 C: 若病大好了, 必要重重的酬謝。

重 D: 若病大好了, 重重的酬謝。

格標記“行”出現 4 例, 1 例保留到 B(3), 其他的換成“上”(1、4)或“前/根前”(2)。例 4 的 C“向師傅稟了”, 轉換成漢語介詞的模式。

(1)

舊 A: 每日清早晨起來, 到學裏, 師傅行受了生文書。

翻 B: 每日清早晨起來, 到學裏, 師傅上受了文書。

新 C: 每日清早晨起來, 師傅根前受了書。

重 D: 每日清早晨起來, 師傅根前受了書。

(2)

舊 A: 對句罷吟詩, 吟詩罷師傅行講書。

翻 B: 對句罷吟詩, 吟詩罷師傅前講書。

新 C: 對句後頭念詩, 念詩後頭師傅根前講書。

重 D: 對句後頭念詩, 念詩後頭師傅根前講書。

(3)

舊 A: 到晚, 師傅行撒簽背念書。

翻 B: 到晚, 師傅行撒簽背念書。

新 C: 到晚晌, 師傅前面撒簽背書。

重 D: 到晚晌, 師傅面前抽簽背書。

(4)

舊 A: 可知有頑的, 每日學長, 將那頑學生, 師傅行呈著, 那般打了呵, 則是不怕。

翻 B: 可知有頑的, 每日學長, 將那頑學生, 師傅上稟了, 那般打了時, 只是不怕。

新 C: 是內中也有皮頑的, 每日學長, 將那皮頑的學生, 向師傅稟了, 就打了他, 他也是終久不怕。

重 D: 是內中也有皮頑的, 每日學長, 將那皮頑的學生, 稟了師傅就打他, 他只是不怕。

“根底、行”在 A 本中共出現 9 例, 保存到 B 本的 2 例, 大約占 22%, 其他的或者不再用

了,或者改用了其他方式。

#### (四) 複數標記“每”

複數標記在漢語歷史中有一個複雜的發展過程,唐代之前主要用詞彙手段,在表人的名詞後面加上表示“等類”的詞語,表達複數。唐代以後逐漸發展出表示複數的詞綴,但仍然基本上只用於表示人的詞彙。蒙古語和漢語是不同的類型,它有完整的複數表達系統,對複數的表達既不區分生物與非生物,也不區分人與非人。元白話同樣反映出蒙古人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在複數表達上,因為母語的干擾而造成的困惑。

目標語習得困難度:三級(母語干擾。目標語中有對應規則,但有差異。)

複數表達元代用“每”,以後變成用“們”;元白話複數表達的特殊之處是除了人之外,動物的複數也可以用“每/們”表達。《老乞大》4種本子裏,A都用“每”,B本以後都用“們”(例1)。表達動物複數的例子,A本出現6例,其中4例A本用“每”,B本改用“們”(例3),2例B本開始就不再使用詞綴了。

(1)

舊 A:每日和漢兒學生每,一處學文書來的上頭,些小理會的有。

翻 B:每日和漢兒學生們,一處學文書來,因此上,些少理會的。

新 C:每日同漢學生們,一處學習來,所以略略的會得。

重 D:每日同漢學生們,一處學習來,所以略略的會得。

(2)

舊 A:人喫的且有些箇,這馬每,卻怎生,一就那與些草料如何?

翻 B:人喫的且有些箇,這馬們,卻怎生,一發那與些草料如何?

新 C:人吃的雖是有了,這馬也當要喂,一發賣些草料,與我喂他如何?

重 D:人喫的雖是有了,這馬卻怎麼的,一發賣些草料,喂他如何?

(3)

舊 A:這馬每都拴住著,教那兩箇起來。

翻 B:這馬們都拴住著,教那兩箇起來。

新 C:這馬且拴著,教那兩箇起來。

重 D:這馬且拴著,教那兩箇起來。

表非人複數詞尾的使用是《老乞大》使用的元白話中特殊語言現象在B本保留最多的,比例占了66%。

## 五 幾點討論

### (一) 特殊語言現象的出現與困難度

四個《老乞大》不同版本中，主要出現了 4 種受到蒙古語影響的現象：

句末“有”，包括動詞和句末助詞兩種。

漢語和蒙古語在動賓語序搭配上正好相反，漢語是 VO 語序，蒙古語則是 OV 語序，蒙古人學習漢語時，因母語干擾而造成的語言習得困難度應該屬於三級。《老乞大》句末的動詞“有”A 本出現 7 例，B 本有 1 例繼續使用。另外用於判斷句的 A 本有 3 例，1 例 B 本繼續使用。兩類一共 10 例，B 本中出現 2 例，B 以後就不再使用了。

句末助詞“有”比較寬泛地說是表達一種語氣，在漢語中語氣詞出現的位置和“有”表語氣的用法相同，只是表達方式有別，漢語使用專門的語氣詞，元白話選擇了與動詞同形的句末助詞，其困難程度可以視為三級。《老乞大》句末表示語氣的“有”A 本 43 例，3 例在 B 中變成了“有餘”，這顯示，B 的時候人們可能已經不太知道元白話中“有”的準確意義了。只有 1 例 B 中繼續使用，而且這個例子還出現於 C 本。

語序差異，從蒙古語的 OV 到漢語的 VO，其間又有漢語受事主語句的混淆。目標語習得對應性差異困難度是三級，但漢語受事主語句與語序的混淆（母語中某個規則/結構，在目標語中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規則/結構），卻造成了五級的困難度。《老乞大》中 OV 語序句子有 13 例，B 本中繼續使用其中的 6 例；這 6 例到 C 本中 2 例換成“把”字句，其他 4 例換成了正常的 VO 語序句子。

格標記是蒙古語中基本的語法手段，漢語中不用，這種母語中無對應規則的干擾，在目標語習得中的困難度是四級。《老乞大》中格標記“根底”出現 5 次，B 本中 1 例繼續使用，2 例在“根底”的位置上換用了“上/跟前”。B 本之後就不見使用了。“行”出現 4 例，B 本 1 例保留，3 例換成“上/前/跟前”。C 本中 1 例轉換為使用漢語介詞的模式。

複數表達方式是一種類型差異，漢語和蒙古語在複數表達方式上有對應規則，但表達方式存在差異，目標語習得困難度是三級。《老乞大》4 種本子裏，在用字上 A 都用“每”，B 本以後都用“們”（例 1）。表達動物複數的例子，A 本出現 6 例，其中 4 例 B 本改用“們”後繼續使用，2 例 B 本開始就不再使用詞綴了。

附表 1：

	A 本	B 本	C 本	D 本
句末“有”（動詞）困難度 3	10	2		
“有”（句末助詞）困難度 3	43	1	1	
語序(OV—VO) 困難度 3/5	13	6		

(續表)

	A 本	B 本	C 本	D 本
格標記(根底) 困難度 4	5	1		
格標記(行) 困難度 4	4	1		
動物複數表達方式困難度 3	6	4		

通過上面的表格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現的語法錯誤(特殊語言現象)都是一些困難度在 3 級以上的語法點,這些語法點或者是母語和目標語之間雖然有成規律的對應,但卻存在明顯差異的(如語序,雖然規律整齊,但學習者短時間內無法擺脫母語的干擾,會出現母語干擾造成的語法錯誤),或是母語和目標語之間規律的對應中,包含某些差異(如複數的表達方式,蒙古語是對所有名詞作統一處理,漢語則是對人一種辦法,對非人生物和非生物使用另外的方式)。這兩種錯誤應該是兩種原因,前一種學習者可以感知目標語的規則,但不能擺脫母語的束縛;後者則可能是學習者還沒有掌握目標語規則下的不規則。雖然都是母語的干擾,但產生的原因或許不同,而錯誤出現的階段也應該有差別。前一種在學習的初期,應該常見,而隨著對目標語的熟悉,改正這些錯誤應該是比較容易的。後者不但出現在學習初期,只要學習者對目標語沒有達到熟練深入的掌握,這些錯誤就不容易改正。

## (二) 語法錯誤的出現與共性

語法錯誤的出現與錯誤的難度有關,在四種版本的《老乞大》裏,我們看到的幾種主要的語法錯誤都是難度在 3 級以上的。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從現代方言和少數民族語接觸的材料看,這些類型的錯誤在現代方言與少數民族語接觸的時候仍然在重複出現。

在對甘肅青海地區方言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河州話在語法方面受到語言接觸影響後最顯著的特徵是“語序表現為 SOV 型”“用附加成分表示變格”;在詞法方面最重要的特點是“表示多數的名詞複數形式‘們’的使用範圍非常廣泛”。(鍾進文 2007:48)如:

你客人們(XA)說給下。(你給客人們說一下。)

北京從回來了。(從:從格)

秀秀的嫁妝移不多的,料子衣服們就裝下者兩箱子。

同樣,唐汪話也是類似的情況:

你飯(XA)吃(X-T)去。(你吃完飯再去。)

我蘭州些(從一比格)來。(我從蘭州來。)

羊 M(複數)趕上進來。(把羊趕進來。)

在五屯、甘溝等地區也有類似的情況。

對比《老乞大》和現代西北方言中出現的特殊語言現象,二者之間有很大的相似性。一般的說,相似的結果應該來源於相似的原因。儘管是不同的時間裏不同的接觸過程,但接觸